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历史溯源

李 潇

摘 要：今年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在这篇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准备的不朽经典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在党内外产生重要影响。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形成，首先是毛泽东本人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长期思考的结果，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历史溯源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此后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标题正式发表在6月19日《人民日报》。毛泽东非常看重《正处》，将其视作建国以后屈指可数的由其亲自撰写的论著之一。在这篇集中讨论“天下第一大事”的著作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并“第一个把它当作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提出来”。如此重要的一篇著作是如何产生的，既往的研究重在探讨《正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正处》形成过程关注还不够，在为数不多讨论《正处》形成过程的论文中，研究者的注意力或放在阐述毛泽东2月27日讲话稿到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稿的修改细节上，或仅从某个方面阐释《正处》的形成过程，研究视角比较狭窄，不

够全面系统，研究深度也不够。笔者以为，对毛泽东《正处》进行历史溯源，首先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从思想史角度系统梳理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思考历程，也要客观评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对《正处》形成的贡献，还要深入分析国际国内背景对毛泽东《正处》形成的影响。只有全面、系统、深入梳理《正处》的形成过程，才能进一步加深对《正处》文本内涵的深刻理解，进而更为准确地把握《正处》在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毛泽东“积累了很久”的思考

《正处》的产生首先是毛泽东本人思考的结果，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毛泽东是从何时开始思考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这一点多被论者所忽视。笔者以为，《正处》的产生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

作者简介：李潇，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校讲师（邮编200438）。

关于此点，《毛泽东传》曾提及：“他（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建国以后，再没有写什么文章了，就是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些按语。”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13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68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20页。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67页。

关于《正处》的产生，学界论述往往集中在横向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对毛泽东本人的思考进行纵向梳理，这方面的研究还较欠缺。如逢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诞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过程》（《党的文献》2002年第4、5、6期）及熊华源《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形成过程》（《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命和实践长期思考的结果,诚如毛泽东本人所言:“我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也专门谈到:“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或者说,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从现有的史料看,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思考大致可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时期。

建国前的思考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矛盾论》,明确指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同时,他又认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在回答矛盾斗争性的问题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他甚至预见性判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成非对抗的矛盾。从《矛盾论》的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毛泽东既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又指出对于不同矛盾需要运用不同方式加以解决,特别是他提出对抗的矛盾和非对抗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非对抗的矛盾等观点,无疑奠定了此后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提出要“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作为整风运动的两条宗旨,这成为解决当时党内矛盾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同时也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对此,毛泽东在《正处》中有过专门论述,他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

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整风运动在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中的重要影响,党内看法较为一致,胡乔木认为整风运动“是建国后提出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的萌芽。有了过去沉痛的历史教训和这样明晰的思路,在群众性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毛主席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的必然了”。陆定一也指出:“把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严格地区别开来,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的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并且从这里开始,逐步地发展了一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方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可视作其解决内部矛盾的初步实践。

建国以后,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思考仍然在继续,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不断深化。195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一文中阐述了人民内部和人民外部问题,明确指出人民内部和人民外部是两个不同范畴,他说:“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同时,他又认为:“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显然,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问题的概念既延续建国以前的一

毛泽东和新闻界代表会谈纪要(记录稿),1957年3月10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中的回顾》下,第408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82、286、308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0页。

对此,已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始终是把矛盾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来运用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先是提出了《论十大关系》,随后提出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12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211页。

陆定一《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

对此,费正清分析认为,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显然希望运用他那‘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能使如何执行政策的‘斗争’继续健康而有节制地开展下去,正如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那样”。参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84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7、158页。

些思考,又结合实践作了进一步发展,特别在区分人民内部与外部问题的同时,明确提出要采取不同处理方式,已逐渐搭建起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雏形。

1956年是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形成的关键时期。当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专门提到是非关系,再次重申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全党必须坚持的方针,他要求党内要分清“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毛泽东看来,是非关系即是是非矛盾,说到底还是内部矛盾,这个提法在毛泽东《正处》中得以延续和展开。

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他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

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毛泽东的这封信,明确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二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敌我矛盾已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三是明确提出两种矛盾的解决方式也不同,敌我矛盾要用镇压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则是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里,毛泽东“把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内容已经阐发出来了”。至此,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基本内核已经形成。

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召开,会前毛泽东亲自撰写了讲话提纲,他在这个提纲中明确指出存在敌我阶级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两类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不同,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和武断压制的方法。而他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是围绕这个提纲展开。从4月24日起,毛泽东开始着手修改2月27日的讲话记录整理稿,前后历经13次修改,6月19日,《正处》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正处》是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体思想和基本观点没有改变。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从《正处》发表稿和讲话稿的比较可以看出,发表稿虽有许多重大改动,但并未改变讲话的基本精神,即其主题、中心思想和基本内容都没有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也为学界所认可:“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开始使用“人民”“人民内部”等概念,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人民内部,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364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4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9、40页。

毛泽东在《正处》中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06页)

毛泽东:《致黄炎培》(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74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中的回顾》下,第41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10页。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敌对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敌对性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而是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参见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0—82页。

相关修改细节参见逢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诞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过程》(《党的文献》2002年第4、5、6期),因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此处不再赘述。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418页。

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

总之,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思考有其“内在理路”,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从时空维度看,毛泽东的思考横跨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时期;从逻辑角度看,毛泽东先从分析、解决党内矛盾入手,进而扩大至全社会范围;从思考向度看,由最初的零星式、片段式思考逐步发展到整体性、系统性论述。纵观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形成过程,既有哲学方法论基础,也有初步实践尝试,更有系统思考阐发,确是毛泽东“积累了很久”的思考。

二、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的探索与贡献

《正处》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既体现了毛泽东本人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其他党的领导人的集体智慧。而关于这一点,长期以来,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笔者以为,在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形成过程中,其他党的领导人也作了有益探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贡献最大的主要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阐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思想体系。

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较早提出“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的概念。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在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谈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依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之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这里,刘少奇将

“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并且预见到随着革命的胜利,内部矛盾所占份量或将逐渐加强,就当时其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言,他的这个判断无疑具有深邃的历史前瞻性。

第二,较早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概念。1951年,刘少奇在审读邓子恢《在中南海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高岗《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两篇材料后,专门撰写了《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对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首先,他认为,国营工厂的内部也存在矛盾,“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司矛盾”。他明确指出:“这种矛盾和关系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其次,在矛盾的处理方式上,他认为:“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

第三,较为系统地论述人民内部矛盾理论。1957年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离京南下,就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次调查非常重视,4月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会议,听取刘少奇对这次五省调查的情况和对有关问题想法的汇报。会议从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这次会议召开后不久,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他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考。首先,他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其次,他认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里,刘少奇专门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再次,刘少奇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小民主,小小民主的办法”;“当着矛盾表现为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708页。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671页。

沈志华、丁明译《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3、94页。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23页。

非对抗性的时候,我们就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

如果说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着更多自己的思考,许多观点与毛泽东不谋而合,那么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则主要围绕毛泽东观点进行了论述、补充和丰富。

1957年4月24日,周恩来就当时国内外形势,在浙江省委第四次会议(扩大)和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指出:在国内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正确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4月25日,周恩来到杭州笕桥机场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专机到达前,周恩来与先行到场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等人交谈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承认矛盾,检查缺失,区别处理方法,就可以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4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党内外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答》的报告,他强调指出:由于过去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主要是处理敌我矛盾问题,很容易把两种矛盾混同起来,这点我们必须谨慎。

周恩来同时还注意到分配问题对人民内部矛盾影响,5月22日,他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中国是个六亿人口的贫穷国家,物质刺激不能太高了,否则会引起工农联盟内的矛盾。我们生产的分配的方法,必须从中国贫穷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经济基础是贫穷的,稍不注意就会使工人内部和工农联盟内产生矛盾,增加矛盾。周恩来的这一论述显然

是对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展开和阐发。

邓小平亲自参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讨论,并且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195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省、市委书记时,指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现在还有两种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现在大大减弱了;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现在突出了,反映在各个方面。社会生活总会有矛盾,有矛盾就要调整。我们把不断地解决问题当成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比较有利,因为人有“气”总要出。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集中出,一种叫分散出。小出“气”了,就不大出“气”了;有“小闹事”,就没有“大闹事”了;有“小民主”,就不“大民主”了。这个道理全党都要想通。人民内部的事情要人民内部的解决方法来对付,不要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在人民内部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特别是对青年。纠正群众的错误,也只有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自己讨论的方法。这里,邓小平首先区分两类矛盾,同时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不断解决问题,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是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这与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邓小平看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既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要解决发扬民主的问题。3月18日,邓小平在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法是加强教育,扩大民主。他认为:加强教育,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闹事就不可避免。扩大民主,主要是指经常的民主生活。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会发生“大民主”。4月5日,邓小平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谈到人民内部矛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96-303页。

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刘时平:《周总理和苏联贵宾在笕桥机场畅谈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4月26日。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8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5页。

根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记载,1957年2月26日晚,邓小平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预备会议,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问题。6月1日下午,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布置整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毛泽东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参见杨胜群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48、1370页。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346页。

杨胜群主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20页。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352页。

盾问题,他指出:去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变得突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比阶级斗争更复杂,如果继续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非犯错误不可。这里,邓小平着重强调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这一看法无疑是富有远见的。

陈云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更多是从经济角度进行阐发。1953年2月5日,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对劳动部关于各地工人来京请愿事件及处理的报告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在财经工作中很多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对待工人生活特别是失业问题很不关心,对于工人提出的能够解决的问题,有的采取推拖办法,不予解决,有的单纯为资本家讲话,有的作风、态度生硬引起工人不满。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相应地改善工人生活,对失业工人,必须依法给予救济。对待工人请愿、罢工等,应首先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并切实解决工人的问题。对破坏分子应在事件中加以注意,事后调查处理。在这里,陈云首先分析了工人失业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同时,明确指出处理工人问题与处理破坏分子问题应区别对待。1957年2月7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十二次全体会议,他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人民同蒋介石、帝国主义的矛盾变成间接的了,同我们的矛盾变成直接的了。他们有不满意的地方,就会找我们闹。对人民闹事问题的处理方法是,提出的要求凡是对的,都应满足;不对的,要批评;有困难暂时解决不了的,要讲清楚,说老实话,除现行反革命以外,一律不抓、不开除。与此同时,陈云还反复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而陈云提出的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总的来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应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不同侧面补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刘少奇的论述,更多地先从哲学上提出问题,将社会矛盾首先区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然后将其运用到政治领域,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别属于哪一种性质。周恩来在宣传和解释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注重改进实际工作,解决矛盾,着重抓了调整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同文艺界的关系、同工商界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效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邓小平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除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外,还要着重解决发扬民主的问题。陈云则注重经济手段的作用,强调从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通过满足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进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陈云这一观点,刘少奇、周恩来也持相同看法。而刘少奇等人的论述恰恰是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尚未充分展开的。由此可见,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形成,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多事之秋”的经验总结

促成毛泽东《正处》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学界对此也多有论及。然而,毛泽东如何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中持续关注、集中思考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方面的梳理还不够细致,脉络也不够清晰。笔者以为,毛泽东《正处》的形成与1956-1957年“多事之秋”有着密切关联,正是“多事之秋”国内外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354页。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3-164页。

《陈云年谱》中卷,第368、369页。

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1957年1月),《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43页。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40页。

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本),第230页。

《周恩来传(1898—1976)》下,第1203页。

《邓小平传(1904—1974)》下,第1020页。

占善钦:《陈云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出席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他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革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9页。

引发了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深刻反思。具体来说,可以从国际、国内影响两个方面来分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考历程。

从国际影响看,毛泽东《正处》的形成主要受苏共二十大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影响。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2月24日的晚间和25日的清晨,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实际是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3月23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毛泽东此时已看到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会上,毛泽东提出,要通过发表文章的方式,表明中共对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态度。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起草这篇文章,并要求一星期写出来。4月4日凌晨,文章清样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在审阅过程中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包括加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的表述。

4月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他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在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同时,毛泽东建议把文章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发表在4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篇“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文章中,明确提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

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这代表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最新思考。

国际上另一个影响就是波兰、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苏联、波兰关系紧张,苏联准备出兵波兰,后经中苏波三方会谈,危机最终化解。11月,匈牙利发生内乱,苏联决定从匈牙利撤军,后经中国政府要求,苏联出兵帮助匈牙利平定内乱。11月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匈牙利问题。毛泽东指出: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会议同时还决定再写一篇文章回应波匈事件。

11月11日,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讲,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11月25日、27日、28日、29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当时国际形势。经过四天的讨论,毛泽东在归纳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指出: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12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胡乔木等起草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初稿,毛泽东特别指出:这篇文章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两者性质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办法。12月19日、20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讨论文章的修改稿,毛泽东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经过政治局12月23日、24日两天会议的讨论,这篇文章

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是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全国建设时期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深刻总结”。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399页。

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9页。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9页。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5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23页。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19-20页。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22页。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第72-73页。

原则通过,确立文章题目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发表在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到《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反映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国际事件的鲜明态度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刻反思。此后,毛泽东多次表达了这一观点,1957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时说:“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肯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这些人民内部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矛盾,当作敌我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阶级矛盾,我们基本上已解决,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这些论述在《正处》中也有反映,他说:“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就国内影响而言,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1956年11月,上海一些合营厂职工由于工资福利等问题发生怠工、罢工、集体上访,有1843人参加。1957年3月—5月全市先后有587家工厂的近3万职工参与了请愿、怠工、罢工等。1956年至1957年4月初,哈尔滨一些企业、技校发生大小罢工、请愿与集体控诉事件31件,有4659人参

加。1956年5月中旬,广西7个县有62万多户加入合作社,在1207个合作社中,有5%的农户退社。1956年下半年,广东退社农户已达7万余户,约占入社总农户1%左右,浙江宁波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5%,想退社的占20%左右。河南临汝县有7个社发生打乡、社干部事件11起,被打干部14人,抢分粮食2万多斤。1957年上半年,山西省共发生社员“闹社”事件144起,参加人数为7298人。

国内连续发生的闹事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956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1956年10月4日关于退社问题报告时,专门加了一段批语:“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今年分配所得,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有些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请你们考虑这个考虑是否可行。如果认为可行,就下决心让一部分人退社。”^①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期间,在听取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汇报后,他就群众闹事发表意见,认为这种现象是对立的统一,无非人民内部和人民与敌人之矛盾,揭露了矛盾就好,就可以解决问题,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②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就闹事问题发表看法,他指出,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最后强调,对于少数人闹事这种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经验不足,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124、130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08、211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400-401页。

《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49、50页。

《哈尔滨工会志·文献篇》,哈尔滨市总工会1991年内部发行,第194页。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44页。

《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1956年12月24日),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649页。

《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1956年12月6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655页。

《关于临汝县“闹社”问题的报告》(1957年1月8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660页。

《山西农业合作史大事记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78页。

②《杨尚昆日记》上,第263页。

这是一门科学,应该好好研究。

3月19日、20日,毛泽东分别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他指出:“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在《正处》中,毛泽东将少数人闹事问题专门作为第九个问题作了阐述,他认为:1956年,个别地方发生的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以及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对于少数人闹事,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此,他又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

由此可见,1956-1957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双重影响触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考,而毛泽东的《正处》正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以及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四、余 论

综上所述,毛泽东《正处》的形成首先是毛泽东本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长期思考的结果,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作为一篇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准备的不朽经典,毛泽东的《正处》在党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高度评价《正处》,

认为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下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也谈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于我们党团结全国人民,胜利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胡乔木认为《正处》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建设理论和政治理论的重要贡献。

如果说,薄一波等人从宏观视角对《正处》的评价,代表着当时党内高层的普遍观点,那么,知识界的微观感受,更能反映出党外人士对《正处》的强烈共鸣。梁漱溟、冯友兰两人参加了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开始“思索人民内部矛盾”,冯友兰也是印象深刻,他说:“他(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会场中的空气非常活跃。”顾颉刚不仅参加了2月27日的会议,听了毛泽东的报告,3月8日还参加小组会,看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6月19日,《正处》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顾颉刚又认真阅读。竺可桢、傅雷、徐铸成分别被安排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了多次参与讨论毛泽东讲话情况,傅雷听后很受启发,^①徐铸成回忆,“毛主席在讲话中深入浅出,妙语泉涌”,“听的人都十分兴奋。以后几天,一直成为话题的中心”。同时,他还记录了与傅雷的听后感受,“我(徐铸成)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录音,感到浑身热乎乎的。他(傅雷)兴奋地说:‘共产主义者遍天下,毛主席真是千古一人’”。^②吴宓则是在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听了毛泽东讲话的传达报告,当时作了非常详细的记录,事后还“撰聆毛主席讲话后之感想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70-7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03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36-237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399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642页。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671、723页。

梁漱溟:《梁漱溟日记》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9页。

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自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八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01、214、259页。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41、542、596、598页。

①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88年,第160页。

②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三联书店,2010年,第231页。

文”。

此外,老舍、茅盾、雷海宗、李四光、梁思成等人相继在《人民日报》或亲自撰文或接受采访,畅谈了各自对毛泽东这篇论著的体会认识,老舍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茅盾说:“要改进我们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应当深深体会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精神。”雷海宗认为毛泽东这个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贡献,李四光将《正处》视作“马列主义在中国又一次伟大的胜利”,梁思成“感到这个报告把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和马列主义的理论这样生动地结合起来,深入浅出地讲清了许多重要的道理”,是“一部最好的政治课本”。党内外对毛泽东《正处》的高度认可,愈加凸显出这篇论著的价值。

然而,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正处》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的坚持,正如胡乔木所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个总

题目,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复杂的工作,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一点没有做。”而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党“还没有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观念转变,仍然习惯于革命党的思维逻辑和工作方法,以法治国这个理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认识上把大变动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敌我矛盾,在实践中就不能不造成‘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尽管如此,对毛泽东《正处》的价值与地位,历史早有定论。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肯定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将其视作1956-1966年十年中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和重要内容,并认为《正处》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正处》中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并未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其基本观点对于当下中国的改革实践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 李孝迁)

《吴宓日记续编》第3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56-63、65页。

老舍:《论悲剧》,《人民日报》1957年3月18日。

茅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人民日报》1957年3月18日。

雷海宗:《雷海宗先生来信》,《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新华社:《李四光发表谈话,党能领导科学工作,希望党员学习科学业务,科学家学习马列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6月25日。

《梁思成谈毛主席报告读后感,勇敢地站出来同右派分子斗争》,《人民日报》1957年6月26日。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667页。

石仲泉:《如何看待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政治概念,当前已经失去积极意义。参见谢维营《理论与历史的背反——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反思》,《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official recognized worship and civilizing the society. The attitudes of the local gentry to the goddess were polarized. How to maintain the “orthodox nature” of the goddess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faced by the local elites.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incense club, public parade, theatre performance and other sacred activities, local people rewarded the goddess, expressed their own interest, enhanced community cohesion, and strengthened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The Birth of “National History”

—An Analysis on the Idea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Writing of General Chinese Histo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I Kexiang and WANG Do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as turning to its modern for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erm “National History” was given new meanings both politically and academically.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 modern nation in China, “National History” was considered not only as a “conceptual tool” for the ris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as a brand new national history similar to the western “General History”. As a result, the numerous writings of the new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became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cultural phenomena i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n Chiang Kai-shek’s Retirement from Office in 1949

(ZHANG Hao)

Although Chiang Kai-shek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retire from office in January 21, 1949, he did not actually resign and withdraw from power. He once did plan to resign before December 28, 1948, but then he decided to retire from office for the time being without resigning and withdrawing from authority. Although he agreed to replace “temporary retirement from office” with “leading the retirement in person” in his statement, he believed that the two meant the same. That’s to say, he would leave the stage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ile the peace talk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going on. He stated that Vice-President Li Zongren would on his behalf exercise the duties and powers of the Presid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ticle 49 of the Constitution during his retirement. With this arrangement, he could resume his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when the right time ca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alized that Chiang Kai-shek did not resign and was still behind the scene. So did many Nationalist party members and the Guangxifaction. The latter went on pressing Chiang Kai-shek to relinquish his power. Generally speaking, Chiang Kai-shek thought that the withdrawal from authority meant a total relinquishment of power while the retirement from office was merely a temporary departure from the stage. To him, retirement and resignation were completely different.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Mao Zedong’s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LI Xiao)

2017 i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Mao Zedong’s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This work has la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classic, Mao elaborated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which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within and outside the party. The theory was formulated when Mao thought of combi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t’s also the fruit of the Party leaders’ collective wisdom, such as those of Liu Shaoqi, 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and Chen Yun. It wa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ruggles made by Chinese communists, among whom Mao Zedong was a representative.